

海外中国
研究丛书

刘 东 主编

SEEDS OF DESTRUCTION

毁灭的种子

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

〔美〕易劳逸 著

王建国 王贤知 贾维 译

▲ 江苏人民出版社

海外中国
研究丛书

刘东主编

SEEDS OF DESTRUCTION

毁灭的种子

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

〔美〕易劳

王建

贾知 贾维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
[美]易劳逸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0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刘东主编)
ISBN 978-7-214-04814-1

I. 毁… II. 易… III. 中国国民党—研究— IV. D693.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56503号

Seeds of Destruct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

Copyright © 1984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07 by JSPPH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0-2005-285

书 名 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

著 者 [美]易劳逸

译 者 王建朗 王贤知 贾 维

责任编辑 王翔宇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pph.taobao.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52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17.5 插页2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5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04814-1

定 价 27.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呀的是,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 东

1988年秋于北京西八间房

中译本序

1949年，中国共产党打败国民党的革命胜利，对美国政界来说，无疑是一个冲击。早在1947年，冷战的飓风已经把华盛顿的政治舞台吹得寒气逼人，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解放，又大大增强了那儿的反共逆流。1950年2月9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的四个月，参议员麦卡锡在一次演说中宣称：“在我手上，掌握着一份为国务卿所熟悉的205人的名单，他们是共产党分子，然而却至今还操纵和支配着国务院的政策。”不久，参议员麦卡锡虽然将他名单上的“叛国者”裁减到只剩81人，但是，他讲辞的主旨依旧如故：在美国，共产党和共产党的同情分子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结果，美国不能给予有力的援助以防止蒋介石政权的垮台。

在最近几十年的美国历史上，对这些人的无休止审查——他们“将中国丢给了共产党”，成了最可悲的冤案之一。国务院内，最富有经验和学识的中国问题专家，诸如谢伟思、戴维斯和范宣德等人，由于他们目睹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积弱，预感到（而不是鼓励）共产党的胜利，而被麦卡锡和他的反共伙伴们诬为共党同情分子，断送了前程。在各个大学，一流的汉学家，像拉铁摩尔和费正清，也受到了类似的诽谤。结果，即使在学术论文和大学讲台上，如果流露出一些对共产党中国的赞赏，也是危在旦夕的。因此，在美国，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受这种歇斯底里的反共压制达十几年之久。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反共淫威的收敛，人们才可能重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胜利，是因为它有坚强的组织和正确的军事战略，也是因为国民党政权失掉了所有社会阶层的普遍支

持。不久，学者们对共产党革命运动历史的研究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解放区和共产党的革命战略的基础，尽管这还不太详细。

但是，当我在着手写《毁灭的种子》这本书时，还很少有学者研究国民党统治区的问题和探讨蒋介石失败的原因。那时，我们对国统区的了解主要是依据一些西方记者的新闻报道、国务院的报告以及对国民党进行揭露的书籍（像陈伯达的《中国四大家族》），然而所有这些东西都只能被看做是“片面的”、“虚假的”，甚至是“共产党的宣传”。因此，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就迫切需要研究国民党失败的真正原因。

在写《毁灭的种子》一书的过程中，我力图用确凿而无可辩驳的材料来分析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很快，我了解到要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材料是国民党自己的出版物。通过与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党史会和调查局档案馆的广泛合作，我得以阅读了大量的国民党政府出版的书籍、文章和报告，如兵役部公布的报告以及国防部对反共战争的正式讲评。而且，我还惊奇地发现，在蒋介石的文章和讲演集里，他对国民党政权内部的实情常常是直言不讳的。

我的研究成果，就是面前的这本书。它主要依据国民党自己的文件，说明了1949年的失败，不是因为缺少美援，而显然是由于国民党自身的弊病和分裂，诸如腐败无能、纪律废弛。本书的英文版出版后不久，雷利·桑德兰（他是一部重要的关于战时在华美军历史的三卷本著作的作者）在给我的一封私人信函中曾对本书做了一个非常恰当的评价，我想，这也是我在写《毁灭的种子》过程中渴望做到的。他写道：“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国民党失败这一问题的新近研究会由《毁灭的种子》而得以开拓。它使我们联想到佛利兹·费希尔《寻求世界霸权》一书的出版（德国，杜塞尔多夫，1961年版）。在费赖堡档案馆，费希尔接触了德意志帝国政府的来往文件。我的印象是在此以前，学者们大量依据的外交文书只能有限地用日记和回忆录来补正，而这些东西自身也值得怀疑，甚至解释不清。1961年，事实取代了臆测。因此，有关德国战争罪行的新近研究是由费希尔起步的。同样，你的工作也是一个开端。谨致祝贺！”

我希望中文本的读者们也会发现这本书是精彩的和有价值的。

易劳逸

原 序

1927年4月18日，国民党在蒋介石的率领下，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数日之前，虽然蒋介石在上海血腥镇压了共产党人，但新政府还是在群情鼎沸之中接管了权力。国民党的统治似乎预示了一个平安、繁荣和民族自强的新时代，尤其是在这个国家被军阀混战耗尽民力，为外国列强鱼肉凌辱之际。

然而，革命者不约而同地发现，治理国家要比夺取政权更艰难。孙中山的革命计划，民主、国家独立和发展经济，提出的是一个难以捉摸的目标。从1927年到1937年，国民党并没有能够解决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种种困难。经济的衰退，日本的侵略和中国共产党人的起义，削弱了国民党改革派的决心，耗费了新政权的物力。国民党统治的头四年，到处是地方实力派的反抗，他们有时单干，有时联合。结果，在1937年7月日本进攻之前，国民党政府大约只有六年安定的时间来推行其复兴计划。

不过，在这十年的最后一二年里，还是出现了一些吉祥之兆。经济稳步上升，各省似乎和中央政府取得了协调一致，民众也基本上对政府抱着新的乐观态度和良好愿望。特别是1936年9月两广事件的和平解决，以及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三个月返回南京，更大大提高了国民党政府的声望。因此，在当时的一些中外观察家看来，国民党政权大概是能够实现其初衷的。^①

^① 人们通常用“政权”这一术语来指他们不喜欢的政府，就像他们所说的“苏联政权”或“卡斯特罗政权”，而不说“美国政权”或“英国政权”。我引用这一术语出于不同原因，即表现国民党政治状态中不可预测的力量可能在国民党、前国民政府以及军队三个中的任何地方。此处并无任何轻蔑的用意。

正是这些假象掩盖了蕴藏着的积弱和动荡。其实，国民党政权在推行其政策、计划，在改变根深蒂固的中国社会的政治习俗方面，很少表现出有何统治能力。它的存在几乎完全依赖于军队。事实上，它只有政治和军事的组织机构，而缺乏社会基础。它与生俱来就是所有政治体制中最为动荡的体制之一。

毋庸讳言，这个政权是和社会脱节的。社会中的集团和个人，譬如一些资本家、地主、学生或爱国团体，偶尔也能够对一些具体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施加压力。但是，并不存在常规的沟通渠道，可以对政府产生作用。这种状况，就像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指出的：“各种集团都可以各显神通，表现出它的独到之处和能力。商人行贿，学生骚动，工人罢工，流民抗议；还有军队政变。”^①国民党政权难以摆脱这些外界的影响，同样，这些影响也很少对他有所触动。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为爱国热情所激起的广大民众，暂时忘却了这个政权所固有的弱点。尽管国民党军队在华东、华北全线崩溃，但蒋介石还是全国公认的领袖。1938年10月以前，蒋介石的司令部设在武汉，于是民众就把高昂的士气和热情誉之为“武汉精神”，以激励所有的政治团体，包括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共同战斗的中国共产党。

但是，不到十年，世界就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国民党政府失去了所有社会阶层的支持。军队缺乏战斗力，知识阶层，包括学生、教师和专业技术人员，绝大多数早已对这个政权不抱幻想。农民、城市工人，甚至商业阶层(如一向对共产党百般恐惧的资本家)也对这个政权失去了希望。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却不断强大。到1948年中，他们的军队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国民党。这支军队具备着无与伦比的坚强战斗力。他们富有革命的热忱，而这恰恰是国民党所缺乏的。因此，上帝的旨意，如果有的话，迅速而决定性地倾向于共产党人。到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被迫放弃总统职位，心灰意冷地引退到老家浙江溪口，最后来到台湾。八个月后，和平之神降临北京城门，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① 亨廷顿，《变化中的社会政治秩序》，第196页。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1937年至1949年的政治巨变呢？是因为抗日战争的巨大负担，把国民党政权推向了失败的边缘？是像国民党人长期以来争辩的那样，因为美国政府在内战的关键时刻背叛了国民政府，中止了对国民党的绝对支持和物质援助？还是因为1937年以前就业已暴露的种种弊病，使这个政权在40年代同共产党斗争时，变得更加脆弱？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采取了类似地质学家研究地球形成的方法，不仅仅限于对表面特性的描述，也不奢望一览无遗。地质学家的方法是，在众多的断层中摘取一系列典型例子。这样，就能具备丰富的材料，对整个结构的形成和发展，提出假设性意见，避免陷于就事论事。

在我的研究中，主要材料来自1937年到1949年这段历史中国国民党政权的许多典型事例。通过对这些事例的具体分析，就可以揭示出许多隐藏于政治现象之下的力量，从而，对历史的动力——它规定了中华民国的必然趋向及国民党最终败于共产党——作出恰当的评价。

当然，这个方法的成功，主要依靠对选择的事例所作的深入分析。在这本著作中，选择事例的标准是典型性和可研究性。典型性要求事例充分反映国民党统治的各个方面。这样，再对其做仔细的研究，就能勾画出国民党统治的总的特点和过程。可研究性要求包含这些事例的材料是丰富的，能产生出有意义的真知灼见（有几次，在我研究一些事例时，由于所需的材料未能具备，所以只能放弃这种努力）。因为，如果对这些材料的研究工作带有选择性的话，那形成的看法将会是片面而经不起推敲的。因此，我认为事例的典型性和可研究性将有助于我们对两个方面都能有所了解，即国民党政权和1949年前的中国革命进程，也有利于研究现代中国的学生们推进他们对这段风云激荡的历史的学习。

本书的第一章所研究的第一个题目是，战时建立于重庆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同以龙云为首的昆明地方政权的关系。早在1966年，谢里登（James E. Sheridan）就用“军阀主义余孽”来说明1928年后国民党

政府尽管表面上统一了全国,而实际上由割据军阀控制的地方政权仍然顽固存在。^①但是,很少有人认识到,甚至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这种军阀主义余孽依然深深地潜伏在这个政权的躯体之内。抗战爆发后,由于蒋介石的许多嫡系部队在战争初期就遭到了覆灭,因此,国民党政权内的政治离心力加大了。照地方军阀看来,中央政府的力量已经相对削弱。这种变化的政治后果是不同寻常的。从此以后,蒋介石政府的领导地位和声望不断遭到挑战。抗战期间,云南势力同中央政府屡次发生公开的矛盾冲突,仇视和猜忌一直延续到战后的年代里,这也许加速了国民党在同共产党斗争中的失败。

中央政府和地方军阀们不能统一,是国民党政权机制的致命弊病。但是,这种分裂状况的病因是什么呢?如果中央政府对地方军阀采取其他的措施,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呢?这正是我们在下面的研究过程中,需要寻找答案的问题。

总的看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现代“农民革命”的典型例子。现有的关于这场革命所做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共产党控制地区的农民以及他们对农民的政策,但是,对国统区的农民则完全忽略了。在本书的第二、三章内,希望通过对国民党政府与农民关系的研究,以弥补这方面的忽略。抗战期间,国民党主要从农民那儿获得人力、财力和粮食的供给以支持战争。因此,农民的安乐是受国民党政策和行为影响的。例如,1941年,国民政府对征税办法进行了改革,开始收取土地实物税而不是货币税。与此同时,各级行政机构也把其他的一些税项加在农民身上。通过对各种税则及其对农民所产生影响的研究,可以入木三分地看到这个政权下猖獗的营私舞弊活动。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政府同税收的承担者农民和在乡村政治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地方士绅的关系。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如同第一章所说,国民党政权机制内的一系列弊端来自中央政府,因此它从未有效地把它的权力贯彻下去。它不得不向地方乡绅退让,允许他们来决定谁应该纳税及交纳多少。在农村中,无权无势的人被迫承担不合理的税收负担。无论在战

^① 谢里登,1966年发表的《中国军阀:冯玉祥一生》,第14—16页。

时或战后，农民对这些及其他一些不平等现象的反应，诸如无休止的征兵拉夫，显然损害了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声誉。

本书所介绍的第三个研究成果是国民党的内幕政治。这是国民党黑暗政治制度的内容之一。因为在这个政权内部，一些实质性的行动和关系往往为宣传和公开的声明所掩盖。然而，非常偶然的是，我发现了这样两件事例可以说明问题，即三民主义青年团和革新运动。通过一些亲身经历者的证词，我们可以认识到国民党派系斗争之深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积弱。

开始，我并未计划把三青团的研究作为本书的一个内容。因为，在我想来，它无非是一个对学生进行控制和煽动的组织。我认为，它对分析国民党政权的整个性质并无帮助。然而，当我的研究工作不断深入，尽管我对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真正展开，但我开始挖掘三青团同国民党之间矛盾冲突的线索，我决定密切注意有关这个方面的材料。台湾当局对我的这种好奇心抱以冷淡的态度。例如，我曾同立法院的一位首脑进行过会谈，他以前是三青团的高级干部。在回答有关三青团同国民党的关系时，他严肃地正告我：两个组织之间根本不存在什么矛盾冲突，他们有共同的革命意志，紧密团结。

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三青团的领导视国民党为老朽无能。他们认为取代国民党应该是这个政权的重大政治步骤。因此，接踵而来的就是激烈的抢班夺权，以及三青团成员对他们的政敌所给予的肆意攻击。

同样是一种巧合，我发现了1944年至1947年国民党的一场改革运动，名叫革新运动。在我早期的研究工作中，我从未听说过此次运动。秋日的一天，当我在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会查阅档案时，意外地发现了一种名叫《革新周刊》的杂志。在这里面，有一些著名的国民党人写的文章，他们对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的揭露，如同共产党一样尖锐。冥思苦想之后，我开始在台北的其他一些档案馆和图书馆收集有关革新运动的出版物。结果是，由此披露的政治内幕并不亚于三青团提供给我们的材料。

从三青团到革新运动的研究结果，我们看到国民党政权早已分崩

离析。国民党人除了个人及派系的利益之外，根本没有共同的奋斗目标。对三青团和革新运动的揭露，说明国民党政权内的民主化要比外界想象的大一些。

国民党政权机构的支柱是军队。军队赋予了 this 政权实力，从此以后，它也就依赖于军事力量继续生存下去。本书第六、七章的内容说明，八年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极其虚弱。在开战的第一年，它就蒙受了极大的、无可挽回的损失，随后他们的战斗力异常低下。第六章所分析的腐败现象，具体体现在军队军官的素质，征兵制度的施行和军队医疗服务的状况。这些现象还说明，在抗日战争最后的艰苦决战中，国民党军队普遍表现出士气低落。

在第七章中，我指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同共产党进行的内战中，国民党军队的素质并没有得到改善。1950年，国民党军方曾经对反共战争做过评讲，正是在这些广泛的材料基础之上，该章的结论是共产党军队已彻底战胜了国民党军队。那些参加过这次评讲活动的国民党将领不仅承认他们的军队士气严重低落，战斗意志消沉；而且对他们对手的领导风范、献身精神和战斗能力大为赞许。这一章还有力地驳斥了这样一种看法，即国民党的失败，是因为美国政府的背叛，造成了武器弹药的缺乏，但是造成军事溃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运用地质学家的方法，使我们在第八章中深入到了1948年8月至10月，金圆券改革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之中。这年夏天，通货膨胀失去控制，为了阻止随着政治崩溃接踵而来的经济崩溃，国民党政府推行了货币改革，以3 000 000：1的兑换率，用金圆券取代法币。同时，政府宣布冻结物价和工资，希望用行政命令来阻止通货膨胀。

在上海，负责执行这次改革的是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据我们所知，与其他国民党官僚比较，小蒋是非常廉洁的，而且热切希望币制改革能够成功。但是，70天的改革恰恰证明是失败的。

对金圆券的研究，从微观方面剖析了战后国民党政权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种种病根。它说明了通货膨胀的不可避免，以及由此给人民生活带来的深重灾难。最后，它说明了因经济崩溃而付出的政治代价。作为未来国民党政府的总统，蒋经国的风格和固有的思想意识，

也在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些对这方面做过研究的学者早已指出，这也是决定国民党命运的一段小插曲。

最后一章研究了蒋介石在大陆最后挣扎的日子里，对他的军队和政权机构方面所做的评价。在此，我们看到，蒋介石坦率地承认了蒋家王朝的种种弊病以及国民党内不断的矛盾冲突才是国民党被共产党打败的原因。因此，蒋介石对国民党人的这种怒斥，使他们不敢相信还有谁会这样写呢！

如果说蒋介石公开承认了其政权的种种弊端，那为什么他不能加以弥补呢？如果我们能够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那我们就能比较好地理解 20 世纪 40 年代的中国革命了。

易劳逸

目 录

中译本序 / 1

原 序 / 1

第一章 地方和中央：云南对重庆 / 1

第二章 农民、赋税与国民政府的统治：战争年代 / 32

第三章 农民、赋税与革命：战后年代 / 57

第四章 国民党的政治内幕：三民主义青年团 / 75

第五章 国民党的政治内幕：革新运动 / 93

第六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军队 / 114

第七章 与共产党作战的国民党军队 / 142

第八章 蒋经国和金圆券改革 / 155

第九章 谁丢失了中国？——蒋介石的自辩 / 186

结 论：暴风雨与革命 / 197

Bibliography / 206

参考书目 / 241

译后记 / 260

第一章 地方和中央：云南对重庆

按照魏德迈将军的说法，“委员长远不能算是一个独裁者，事实上仅仅是一帮乌合之众的首领而已。他常常难以保证推行自己的命令”^①。说蒋介石不是一个独裁者，不过只讲对了一半。九州之地，蒋介石的手脚能够达到的地方，他的飞扬跋扈往往是独裁和专制的楷模，譬如，他会心血来潮地杀死一个贪官污吏或败军之将。但是，有一点魏德迈将军可以自信是说对了，就是蒋介石以及国民党政府的权力往往受到各种牵制。

即使在那些国民党政府直接控制的省份里，基层权力机构也会由若干中央政府驾驭不住的地方士绅来把持。几乎有一半的军队是受一些并不绝对服从中央命令的将领指挥。在 20 世纪 40 年代的整个十年间，许多省是在既不忠于蒋介石，而又擅自巧立军政名目的“省主席”统治之下的。因此，如果以当代西方的国家观念来衡量，国民党中国同同时代的欧洲国家相比，并不能算是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这一事实对抗战中国国民党的言行举止不无影响，显然也促使了它在 1949 年的垮台。

战前十年，国民党中央政府竭尽财力，一心想扩大它的统治区域。到 1937 年，中国版图的一半已不同程度地受其领导。但是，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国民党对一些省份的政治控制程度大大削弱了。由于日

^① 魏德迈，《魏德迈报告》，第 323 页。

本人很快占领了人口稠密、相对发达的省市,而这些地方是国民党中央政府政治和经济的立足之地。因此,1938年底,蒋介石及其政府就不得不退入国民党统治最薄弱的大西南。在那儿,封疆大吏们对中央政府充满着猜疑、敌视和戒备之心。

例如,1937年春天,在四川的地方杂牌军和中央军几乎酿成火并,只是在经过一番紧张而又微妙的谈判之后,才消除了重庆和南京之间的龃龉。1938年1月,四川省主席刘湘在南京的医院咽气之后(他八成死于胃癌),他的老婆和川军部下又大声指控这是中央政府为了搬掉执掌川政的障碍,才将他暗杀的。于是,四川的实力派拒绝张群接替刘湘当省主席。八年抗战,川省的“诸侯”,像潘文华、刘文辉、邓锡侯,就自始至终抵制着中央政府对战时天府之国的觊觎。^①

抗战期间,阎锡山同重庆的关系更是一面镜子,反映了国民党的政治联合体是多么脆弱。当战端初开,阎锡山就被任命为二战区司令长官和蒋介石手下的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可是,八年抗战,他从来没有莅临过重庆,更没有同蒋介石见过一面。虽然山西大部分地方已落入日本人和共产党手中,但他盘踞一隅,俨然是一个独立王国。阎锡山打出了自己的政党,名为民主革命同志会。他决不容忍中央军进驻二战区,并且抹去了他为中央政府和蒋介石效命的诺言。尤其是1942年后,他发展了与日本人密切而亲昵的关系,甚至在日本人占领的太原建立了双方的联络处。

在阎锡山看来,战争后期,日本人对他的威胁远不如中央政府。据阎军的一个将领讲,在二战区,写在墙头标语中的“敌人”,首先指的是共产党。在阎锡山的名册上,二号敌人是时不时吓唬和插手山西事务的中央政府,下一名是日占区的汉奸,最后才轮上日本鬼子。^②

每个省同重庆中央政府的关系各有特点。有些省,像贵州和浙江,是绝对服从重庆的。另外一些省,如广东,军事长官余汉谋的忠

^① 卡普,1973年发表的《四川与中华民国》,第121—141页。

^② 美国战略情报局文献XL24905,1945年10月29日;《新民报》(重庆),见1945年10月28日《中国新闻评论》;谢伟思,第57—61页;《亚美杂志论文集》,第1卷第767—775页。

诚度则为重庆深信不疑的省主席李汉魂所弥补。云南则大不一样，很难说它属于这类关系中的哪一种。但是，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该省的具体情况，就能够看到一些对蒋介石脆弱的政治联合体至关重要的因素。

抗战爆发以后，云南才在国家政治中享有一席之地。由于战争推进到西南各省，它已是中国政府不可争辩的组成部分。但是，就文化和种族而言，云南还是化外之地。它离加尔各答比上海更近，缅甸和法属印度支那和它毗邻。如果以内地的标准衡量，它的人口稀疏、土地贫穷，而且大半部分算不上汉化。法国人占有昆明到河内的铁路，为云南首先触及外部世界提供了便利，也输进了法兰西的雪茄、枪支、文化以及经济渗透。在省府昆明，颇有法国风味，鳞次栉比的法国公馆和住宅错落在熙熙攘攘的中国街区中。一点不假，直到1940年，驻昆明的美国领事馆，在其财务报告里还多半用法国比塞塔作计算单位，而不是云南当地货币。^①然而，云南人对一切外来势力都心存戒意，不管是法国人还是汉人。在整个过程中，他们把自己深深地禁锢在封闭自守之中，倔犟的感情壁垒抵制住了中央政府的介入。

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云南的军阀是龙云(1888—1962)。龙云出身于省内最大的少数民族之一的彝族，他很少涉足家乡云南境外。年轻的时候，他参加过活跃在云南的半公开的秘密会社。1910年，22岁的龙云投靠了云南省武备学堂校长唐继尧。唐收下他当了一名学生官，从那时一直到1927年，他们俩星月同升，交相辉映。辛亥革命后，唐继尧成了中国西南主要的政治实力派。在他手下，龙云确实从军阀和国民党杂乱无章的政治中学会了不少东西。这位乖巧的学生，终于在1927年发动了一场政变，赶走了恩师，取而代之当上了云南省主席。到1945年被蒋介石拉下台来，龙云始终是云南政治中的土皇帝。^②

^① 铂金斯致国务院函，1942年8月31日，美国国务院文件，893.00，中国云南/162，第8页。

^② 波曼编，《中国人物传略词典》，第2卷第457—459页，第3卷第223—225页；霍尔，第56—61页。我感谢约翰·霍尔先生对本书早期版本提出的意见。